



现实中国的想象方式

——近期文学期刊的观察 □教鹤然

长久以来,纯文学杂志有着专属于它的历史厚度与文化品位,一方面通过刊发编选文学作品令读者感受精神世界的开阔与思想格局的纵深,另一方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时代潮流的轮转与社会现实的嬗变。在最近的文学刊物上,我们能够发现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当代写作的新的发

性别、空间与女性命运

自新时期以来,世俗生活的常态化书写透过身体、空间与性别等文化表征而不断被阐释,身体的生产与成长、空间的流动与置换、性别的展示与压抑等都可以成为现实中国想象方式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文学界似乎出现了一种对于性别意识有意回避的倾向,可喜的是,新近文学刊物上的许多作品开始重新直面这些具有尖锐性和迫切性的沉重文化议题。

朱一叶的短篇小说《消失的女孩》(《芙蓉》2019年第5期)将性别、成长、生死等复杂而丰富的议题糅杂于吃酒和梦魇一般的故事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难以离析,在最为平常的家庭生活叙事与女童成长书写过程中,沉重地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消失过程。作品呈现出的重男轻女的社会问题是最为表层的现象,更深层的精神在于对社会伦理与人性内核的深刻剖析。刘荣书的短篇小说《扯票》(《民族文学》2019年第9期)讲述了再生家庭和隔代教育之下成长的留守女童出走与回归的故事,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底层市民困窘而尴尬的生存状态。小说冷静地直视当下,避免道德批判或有意粉饰,呈现出比文学更为丰富的生活本身,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径,并将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扩大。

在性别与身体议题之下,写作者不仅关注女童的成长,也关注少年的成长。李智明的短篇小说《往事》(《当代》2019年第5期)有着多重时间维度和空间厚度,小说以少年小玟的死亡和警察对男主人公齐格的追问作为开端,故事的缘起是一碗没有加苹果的冷面,住在大院的几位10余岁少年用板砖拍了冷面店伙计的脑袋,齐格听闻出了人命而离家出走,一直睡在水泥管子里,与青塔的社会青年小玟偶遇。随后,小玟因齐格发烧而去药店偷药被卡车撞死,齐格因此结束逃亡

回到大院,随后得知此前出了人命不过是伙伴的谎言。小说内部的叙事逻辑在于少年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想象、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责任的逃避,叙述者抽丝剥茧般揭开一层层想象的面纱,告诉读者少年成长的代价就是面对现实。马悦的短篇小说《一枚米果》(《民族文学》2019年第9期)以粮食作为物象,以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关注农村与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性别、身体和城乡都是小说展开的重要立足点。

关于女性命运的关注,更具典型意义的文本是非虚构作品。李修文的散文《恨月亮》(《当代》2019年第5期)以一种非线性叙事展开写作,互相交织、穿插着讲述了两个与现代文明和都市风情迥然相异的乡土中国故事,那是两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一个发生在骆驼刺、芨芨草、松树林遍布的山野间,飞鸟走砾,狂风呼啸的戈壁滩,另一个在冰雪交加的山林旷野间,两个不同的时空环境交错呈现。在甘肃,“我”孤身一人在戈壁中徒步前行,偶遇一队聋哑人,互相帮扶、互相提醒,最终走出困境。在贵州,“我”和一个身患尿毒症浑身浮肿的女孩小鲁,为了3个在外打工的未婚弟弟早日成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隔壁村相熟人家的菜地偷一些青菜,寻一个好兆头。禾素의长篇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民族文学》2019年第10期),讲述了数十年间在香港地区勤垦生活、敬业工作的普通话推广工作者的故事,这些推普工作者大都是来自内地、嫁到香港的普通女性,她们或经历了感情与家庭的破裂,或面临着经济与生存的危机,最终通过推广普通话、传承中华文化的工作,在旧殖民属地余痕处处的香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位坚韧的女性,每一具女性的身体都满载着内地与香港之间文化交流的变化印记,正如故事结尾所说:“春天里的人们,脚不停歇奔走在路上,辛劳而又内心充实”,正是这些女性步履不停的行走,将个人与时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日常生活书写与宏大叙事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异军突起的先锋小说,当代中国文学遭遇现实主义写作的危机。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发源滥觞将有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再次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在近期文学刊物上,左马右各的短篇小说《明天我有事告诉你》(《当代》2019年第6期)、李潇潇的短篇小说《小男孩》

(《当代》2019年第5期)、马拉的短篇小说《窒息》(《芙蓉》2019年第5期)、李学辉的短篇小说《我的二次元时代》(《星火》2019年第4期)等,似乎能看到一种“新写实”小说的复归。马拉的《窒息》通篇着力表现张一鸣、周晶与吴一梅、赵毅阁两夫妻琐碎、重复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夫妻双方既无法调和又无可奈何的家庭矛盾。该小说一方面延续着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池莉、方方等“新写实”小说的隐含作者叙述视角及“零度写作”的叙述情感,另一方面,对生活价值的“发现”,往往也可能伴随着神圣知性的“失落”。

近年间,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将社会和文化作为整体来看待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这种国际潮流与研究范式不仅传递至国内历史、文学研究领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标准产生了影响。乔叶的短篇小说《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花城》2019年第4期)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年男子聚餐吃饭、喝酒、闲谈的生活常态书写,穿插着关于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知识介绍。实际上,却在呈现世俗社会的饭桌文化之余,以艺术涵养的较量作为席间的交错觥筹,巧妙借用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故事暗讽当下所谓的“大师”“画家”和陪客们。这篇作品的意义不只对与作家有共同经验的极少数读者生效,写作者将小说背后具有生命张力和阐释可能的庞大意义空间向读者展开,以一种面向自我的内向性写作形式打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是最具有生命张力和想象活力的文体。诗歌语言的开放与灵动会带来诗意格局的天马行空,当愈来愈繁杂的日常生活细节充盈诗行的时候,诗歌便从超验的想象退回了时代现场,诗歌语言和诗意空间的富有、宽仁与无畏也就黯然失色了。如风的《在远方,遥望着远方》组诗之二《中年书》(《星火》2019年第4期)中有:“风吹人间/可是,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光阴让我们挥霍。我开始节制地使用一些词语/就如同,小心翼翼避开玫瑰和它们的刺。”这首写满世俗生活与中年危机的诗歌,呈现出部分当代诗人近年间的一种写作倾向。在郑小琼的诗歌《域外十四行之法国》(《山花》2019年第10期)结尾,有这样的诗句:“诗歌练习着大都市的纸醉金迷,它们披上/五大街的时髦大衣,塞纳河分担我的想象/如今的诗人们习惯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显而易见,诗人提醒我们,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当“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成为写作者的惯性思维时,耽溺于对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和“平凡

在最近的文学刊物上,我们能够发现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当代写作的新的发展路径。写作者以不同视角介入现实,关注社会生态的多维空间,尤其集中聚焦于性别与身体的隔膜和碰撞、日常生活书写对于宏大叙事的建构与解构以及“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尝试。

性”的书写,有可能存在解构当下宏大叙事话语框架、消解当下时代社会问题严肃性的弊端。

“超现实”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

与聚焦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学写作相对应,近期文学刊物中我们读到许多着力于生动的故事情节、形象的人物塑造和强烈的戏剧冲突的作品。写作者通过“超现实”的传奇笔法将现实世界的万千纷繁重新组合,勾勒出想象中国的人生百态。

王松的中篇小说《别字》(《收获》2019年第6期)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小说讲述了一位中学教师在聚会中猝死的离奇案件,案件的关键物证是一张写着“翌”字的纸片。这样一个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故事暗合着对中国基础教育、文化风气、社会变革等问题的反思。田老师的死亡是她的女儿们、学生们、老年公寓的护工、医生和她自己共同促成的,一群各怀心事的旧时同窗、一次在老年公寓举行的以庆祝教师节和老师生日为由头的同学聚会、一场莫名其妙的“凶杀案”,如同一副精心布置的多米诺骨牌,牵一发而动全身。雷默的《大樟树下烹鲤鱼》(《收获》2019年第6期)和双雪涛的《火星》(《花城》2019年第4期)把这种“传奇”笔法进一步推至极致,前者讲述的是小县城名叫“大樟树”的小饭店厨师老庄烹饪鲤鱼成名的故事,后者讲述的是旧日恋人魏铭磊和高红两人通信的往事。“超现实”的传奇笔法将小说的发展推至完全超出读者预期的方向,使得作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但在“好看”的形式之下,如何能够保证现实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纵深感,是写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科幻思维与世界观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创造和建构现实的无限可能。因此,科幻作品应与社会现实精神价值并行不悖,换言之,科幻这种看似“超现实”的写作类型本质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在近新的文学期刊中,我们能够发现许多写作者正在进行“科幻现实主义”的写作尝试。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刊中的科幻作品在“科学”与“幻想”方面所达到的宏观视野与思想高度参差不齐。

对“时间”和“空间”的讨论是科幻作品的核心母题,“时间旅行”与“穿越时空”的形式是传统科幻想象的基本着力点。宝树的《退行者》(《天涯》2019年第5期)没有正面描绘“未来”,而是将时间的顺序倒置过来,不断从“现在”退回“过去”,意在在于通过时间的“退化”而发现生命的不可逆性。但这种处理方式在棍尾真治的《时尼的肖像》、菲茨杰拉德的《本杰明·巴顿奇事》和简井康隆的《穿越时空的少女》等科幻小说、影视甚至动漫作品中已屡见不鲜,写作者并未超越此前对于时间母题的哲学思考格局。陈楸帆的中篇小说《无罪之人》(《花城》2019年第4期)将未来世界的掌权者虚构为一个庞大的将生物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结合的“生命链”债务集团,它们利用债务数据区块化加密后嵌入DNA链条,使得“基因债”可以通过基因遗传而不受控于生命体的消亡而代相传。主人公“我”在目睹了一个个鲜活的少女用太空工作偿还债务时发生意外死亡后,陷入了认知上的困境,终于愤然而起破坏了精密的系统,成为“无债之人”的精神领袖。小说既紧密结合当下前沿科学技术的复杂生态,又对于可能被技术颠覆的未来世界进行了合理预言,为重科学的“硬科幻”写作做出了有效尝试。

■第一感受

历史的痒处与现实的难题

——读薛燕平《宽街》 □樊迎春

薛燕平擅于书写北京胡同文化,新作《宽街》虽然仍有浓郁的京味,却不能单一论之。这是一部歌颂母爱之作,一部揭示女性苦难之作,但也是一部书写历史转折与人心变化难以同步的现实之作。更为重要的,这还是一部描写邻里冷暖关系的思古之作,一部理性与现代性发展的反思之作。我们时常在历史的长河中关注那些光鲜亮丽的伟岸形象,但平凡人生中的多的是被浪潮拍打在岸边的卑微个体,他们当然不是时代进步的号角与先锋,却是木桶最短的一截,控制着历史进步的速度,决定着时代能完成的位臵,更让那些在惊涛骇浪中起伏的人们瞥见自己获得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

《宽街》中,一个院子里住着同一个事业单位的两个上下级干部,他们的妻子都是家庭妇女,小说不仅直接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干部家庭的现实状况,也隐含着妇女解放、扫盲等多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叙事线索,这虽是一个历史故事,讨论的历史问题却如此具有当代性。比如,小说中写到,生了4个女儿的素花无论多么任劳任怨,依然得不到婆婆和丈夫的欢心。生不出男孩成为素花的“原罪”,丈夫外遇便也理所应当,遑论日常生活的冷暴力。如今60多年过去,2019年身处困境的女性和1957年的素花仍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依附、痛苦、煎熬,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如果女性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办法回避的难题,那么当代女性与上世纪50年代的素花处境相似,则是更为沉重的启蒙困境。

当然,在时代的主题之外,《宽街》其实是温良的,选取了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几乎是最平和的那一两年,是处于历史夹缝的一段静好岁月。高门大户的岳家还可以大张旗鼓地娶亲,还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同一个院子里住着的两家人虽各有心思却也能在遇事时发自内心地给予他人同情与帮助,被批判者的孩子还能得到邻里毫不顾忌的关照与爱护。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和克制,也是对特殊年代胡同生活的温情表达。

《宽街》总体而言是妥帖自治的,难得的是这份不事张扬的叙述,但深处的对时代和历史的反思多少失于浅尝辄止,一个伟大母亲的故事从不罕见,罕见的是故事之中有可撼动时代的摧枯拉朽,有可直击人心的绵里藏针。在这样的意义上,《宽街》伸出了触角,又蓦然收回。这触角虽不算尖锐锋利,却多少以温柔态势触及到了历史的痒处。

《他日物归谁》是荆歌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10个关于收藏的故事。荆歌讲故事的能力依然出众,小说叙事如鱼翔浅底,有种“空游无所依”的自得。形形色色的宝贝牵出种种光怪陆离的故事,各种身份和经历,因为“收藏”的主题被拢到了一起。“收藏”一词,听来颇有文化意味,荆歌却反其道而行,将里面的“俗套”讲得熟极而流。

有一类故事是处于日常经验之中的,比如《他日物归谁》。没钱没地位的陈立为了搞收藏,从不乱花一分钱,在经历了“吃药”“走眼”“交学费”的锤炼之后,他似乎也成了一个懂得收藏“金科玉律”的玩主。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收藏血泪史,本身就是收藏故事里的另类。荆歌的精彩叙事还不止于此。阿立的妻子,才是真正将这个故事推向高潮的关键人物。围绕一只袖炉的讨价还价,让她陷入了一场剧烈的内心风暴:经过议价、拒卖、再兜售、终于忍痛出货的折腾,获利并没有让她体会到幸福感,而是带给她患得患失和最终吃亏的体验。小说结尾,阿立留下的那些不辨真伪的藏品完全毁掉了她的生活,同时也失去了对人心和所处世界的信任、判断和认知。

还有一些故事,已经偏离常规,带有了迷幻色彩和惊悚意味。《海兽葡萄镜》讲述了晚晚一家人的故事。作者刻意渲染了一种压抑和不祥的故事氛围:家里带着土腥味的出土文物,进进出出的“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盗墓人,阴森森、冷冰冰的爸爸,以及他津津乐道

■评论 一面向光 一面向暗 ——读荆歌《他日物归谁》 □朱红梅

的那些或被饿死、或被活埋的盗墓人故事等等。小说情节在家庭成员之间展开:失踪的宠物猫咪斯瓜、过世的奶奶、酗酒的妈妈、冷血的爸爸……对晚晚来说,家庭不是世俗意义上爱与暖的港湾,而是纷至沓来的秘密,是亲人间目眦尽裂的背叛和伤害。荆歌用一种变形的叙述表达了变形的伦理关系和残酷真相,对于人性的乖张和疯狂,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抱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之后的欲言又止。

说到收藏,荆歌的理解是,“玩古收藏这件事,说风雅高尚一点,是走进历史玩味文化悦性怡情。但是换个角度看,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为了满足占有欲。是人类贪婪的天性在作祟。”古玩江湖声色各异,既像万花筒,又似激流险滩,这里的种种机关和险恶,与人性的贪婪、自私、欲壑难填似乎是天然的契合,更有着猝不及防的冲撞。古玩与人心,一静一动,有着实与虚的对照、欲与灵的较量。沸腾的人心让静止的器物具有了颠倒众生的魔力,而物又将人含而未发的勇猛和戾气鼓荡得淋漓尽致。荆歌将对这关系滥觞在自己的系列小说里,构筑了种种欲望交织、爱恨纠缠的画面和场景。

欲望的主题在荆歌笔下,总是与死亡捉

对厮杀。而所有的死亡背后,不外乎情爱、名利、意气之争,人性的偏执和缺陷暴露无遗,死亡似乎是作者提供给欲望的最终出路,又似乎是临终审判。作为爱欲的极致体现,性表达在文本中处于突出的地位,这种表达又直接作用于部分女性角色的刻画与塑造。荆歌小说里的女性角色不纯粹是被动的、模糊的、为欲望所牵引的符号,相对于角色的功能性,作者赋予了她们思想与性格,例如《珠光宝气》中的周芳芳,《看花如我》的郑薇,她们在两性关系中不甘心沦为附庸,不愿成为物欲化对象,可行动中却勇敢又犹疑,甚至不乏失面子的妥协。当然,荆歌并不全然沉醉于这一类汪洋恣肆的欲望叙事,他也会有意脱出自己熟悉与擅长的模式,去尝试别一种可能。这本集子里,《菱花镜》是面貌独特的一篇。情节很简单,人物也是一反常态,写的是500年前的古人:一个精通琴棋书画、才貌双绝的少女青婉,处在亲人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保护下,活到了人生的黄昏。但是,“她没有自己,她真正的自己在琴里,在书里,在画里,在诗里”。荆歌此前用小说表达了人类在欲望泛滥中迷失自我的99种境况,但最令人绝望和恐惧的却是第100种,即对自我的绝对禁锢,对欲望的

吕梁精神的新时代书写

□闫卫星

首民歌蜚声在外,但民歌背后所蕴含的“红色富矿”却随着歌声渐渐埋没于岁月的深处。白占全将一块块历史碎片精心缝补,通过艰辛创作,还原呈现了那段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在抢救历史红色文化这一点上,《下柳林》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柳林在抗战时不仅因为商贸活动频繁被称为“小北京”,而且作为连接晋陕两地的重要交通要道和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柳林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倔强和勇敢,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真实写照和微缩景观。题材好还需细打磨,在《下柳林》中,不仅用了大量的本土方言,而且将当地民俗文化穿插其中,显示了作者深厚专业的民俗功底。

《下柳林》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

活人物,除了张氏三兄弟,还有二不愣、改瑛、肖琪、陆彦龙等一大批各色人物,他们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镌刻在了柳林这方厚土的记忆里。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抗战者和汉奸,立场的对立是最基本的冲突。白占全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和场景及心理描写,让人物可感可触,生动丰富。比如写玉骥与肖琪的感情,尽管他们是游击队的骨干,可同样也有七情六欲。如何表现这种情感对作家是个考验,《下柳林》中的男女爱情温婉而不失严肃。玉清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在书中几乎是以完美人物出现的,可作家在艺术手法上运用的是“残缺美”的效果,安排这个人物以壮烈殉国为结局,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玉清是游击

队里的好苗子,各项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他和改瑛的爱情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也一波三折,面对种种险情,他都以大局为重,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担当。这样一位能屈能伸能文能武的干将,最终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而正是以玉清为代表的一大批仁人志士的牺牲,才换取了革命的胜利。此外,《下柳林》里,作者没有将好人坏人脸谱化,而是将人物塑造得既有时代感也符合人性,小说将兄弟间的道路抉择、命运走向放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更凸显出情节的丰富性、历史的复杂性。

《下柳林》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同时带有明显的纪实痕迹,书中不少革命者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小说细节严肃真实,读者在本书中不仅看到了中国军民对战争的反感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而且看到了日军中也不存在有明显的反战情绪。比如佐藤,他在玉清的策动下,成功逃脱敌部,被党组织送到延安参加了反战同盟。可以说,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小说《下柳林》正是在战争书写之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内涵。